

中国古代的外来宗教

刘爱兰

前 言

1368年1月23日，出身贫苦农家的朱元璋身穿皇袍，头戴冠冕，在文武百官的朝贺下，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他把他的王朝称为“明”，即大明帝国。

朱元璋为何定国号“大明”，说来话长。据说，“明”含有明教之意。它是一种外来宗教，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216—277年）创立。摩尼教宣扬善恶二元论，以二宗（光明、黑暗）三际（初际、中际、后际）为根本教义，认为“先知”摩尼做为明王的使者，以施教化战胜黑暗，最终将实现光明王国。摩尼教于唐初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内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因佛教的反对而遭禁止，但此后不久，借助回鹘力量，又在长安、洛阳及荆楚诸州传播开来，成为佛教以外的“外道”各教中流行最广的一种宗教。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摩尼教受到严重打击，寺院被毁，教徒被迫还俗，以后便成为秘密宗教继续在民间流传。到了宋代，根据摩尼教崇拜光明的意译，又称为“明教”。唐代以后，明教主要在广大下层百姓中流传，并走上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明教所宣扬的达到光明之国的宗旨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为其其他秘密教派吸收利用。其中白莲教就吸收了明教二宗三际及其明王信仰。白莲教后来成为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旗帜，起义农民中有许多白莲教信徒，他们企盼着“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朱元璋龙袍加身，以“明”为国号，不仅顺应了民心、民意，也喻意着朱氏王朝将如日中天，永放光芒。

悠悠古中华，上下五千年，多少事犹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仍有数不清、述不尽、令人难以忘怀的桩桩往事，历尽沧桑，积淀成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千古不朽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外来宗教，宛如色彩斑斓的中国古文化中的一朵小花，熠熠闪亮，吸引人们去认识她，了解她。

那么，中国古代的外来宗教，究竟有哪些呢？这些宗教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中国境内进行传播的？在传播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是怎样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呢？

除摩尼教外，中国古代的外来宗教还有佛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公元前6世纪由释迦牟尼（前566—486）创立的印度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内地。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视火为善和光明的化身，崇拜圣火，因此亦称拜火教。此教曾为萨珊波斯的国教，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传入我国，称为“祆教”。公元5世纪前半期，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利（约380—415）创立的聂斯托利派，因宣扬耶稣兼有人神二性的新说，被判为基督教的异端。此派曾在西亚和中亚流传，7世纪时传到中国，称为景教。由穆罕默德（约570—632）于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的伊斯兰教，也于唐代传入中国。由希伯来人创立的古老犹太教，奉雅赫维（JHWH）为唯一真神，是一神教宗教，随着犹太人的东来而传入中国。至迟在唐代，中国已有犹太人活动，到了宋代，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犹太人社群，其中以开封犹太人为典型，并建立了开封犹太寺。中国古代犹太人称其宗教为“一赐乐业教”，实为“以色列”的音译。俗称挑筋教。《旧约圣经·创世纪》载，犹太民族先祖

雅各，曾和一位天神摔跤较力。天神见雅各力大无比，胜不过他，便伤了他的腿筋，使他成为瘸子。为此，犹太教徒在宰杀牛羊时，挑去腿筋不食，故有此俗称。

中国古代的外来宗教除印度佛教外，都产生于古代西亚，其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横贯中亚的古丝绸之路。外来宗教的信奉者，初始大多为侨民，以后便不同程度地在民间流行，但犹太教的信奉者基本上是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

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以及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罢黜佛教，株连祆、摩、景教之事，但总的来讲，都得到了封建朝廷的认可和支 持。东汉明帝曾于永平八年（65）派蔡愔、秦景等 18 人到大月氏请佛像，求佛法；南朝的宋文帝、梁武帝则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公元 649 年，著名法僧玄奘访印讲学，载誉归来，唐太宗亦曾派人迎接。祆教初入中国时，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奉祀。另外，长安、洛阳等地的祆寺、摩尼寺，长安、江宁、广州等地的清祆真寺以及开封的犹太寺，也都是在皇帝的昭示下建立起来的。唐高宗时，于诸州各置景寺，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景教出现了“法疏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外来宗教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很快便为奥妙无穷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并受其熏陶，努力将中国文化融于自己的宗教之中。唐玄宗时在华的摩尼传教师奉诏撰写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书，即把摩尼、释迦牟尼、老子三大教主视为一源。景教僧在翻译经典时则大量引用了佛、道术语。犹太教的信徒们将“至尊无对”的最高神雅赫维，借用中国儒经上的词汇，称为真天、皇天、昊天或简称天、帝、主。

古代中国的外来宗教，其中或因信奉者多为外侨，如祆教，或因其教义、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距离较大，如景教，或因在流行中，随着信奉者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如犹太教，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之后，便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但透过残缺不全的寺院遗址，似乎还能使人联想起它们昔日的辉煌。摩尼教在唐代以后转为秘密宗教，曾在民间广为流传，随着岁月的逝去，也已销声匿迹了，只有坐落在福建晋江县华表山、据说建于元代的摩尼教草庵遗址中的摩尼光佛雕像，面目依旧，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什么。唯有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的儒玄学说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和伊斯兰教，至今仍在中国流传着。

一、佛教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历时近两千年，是传入最早、流行最广、传播时间最长的一种外来宗教。佛教经过长期的传播与嬗变，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三大系，即汉语系的汉地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的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座部佛教。

1. 释迦牟尼与佛教

①佛祖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他未成佛以前的名字叫乔答摩·悉达多，前者为姓，后者为名，悉达多意译“吉财”。他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释迦族，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一说释迦族选举的酋长）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根据佛教传说，母亲摩耶夫人是拘利国的公主。某日，她在花园中梦见一只小白象投入其右肋，于是受孕怀胎，那一年，她已 45 岁了。按照印度的风俗，妇女

怀孕后，必须回娘家分娩。摩耶夫人在回娘家的途中，于迦毗罗卫城郊的蓝毗尼花园生下他。悉达多生下只有七天，母亲就去世了。姨母摩诃波闍提，为净饭王继后，将他抚养成人。

悉达多自幼天资聪慧，相貌端庄，净饭王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继承父业，成为统一天下的“转轮王”。他从小受到了各方面严格的教育和培养。他不仅师从婆罗门大学者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文化知识，还跟武士习兵法练武艺，成为一名知识广博、善骑射、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王族子弟。但是，悉达多却不愿意成为父亲所期望的“转轮王”。究其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

当时印度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分布着大小十六个独立的国家。各国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经常混战，民不聊生，悉达多所属的释迦族，也受到了邻国的骚扰与威胁，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另外随着古代印度阶级和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种姓制度，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印度种姓制度是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它借助宗教和法律，用等级的形式把阶级压迫现象以及社会分工过程中形成的各个社会集团加以固定，使之僵化不变。古代印度把人分成四个种姓，即四个等级。最高的为婆罗门，由祭司组成，掌握神权；其次是刹帝利，属军事贵族，掌有军事和行政权力，国王多为他们出任；第三是吠舍，成员主要是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属平民阶层；第四是首陀罗，这些人无任何财产与权利，处于被奴役的奴隶地位。另外，还有一些从事所谓“贱业”的人，如清道夫、屠夫、搬尸工以及婆罗门妇女与首陀罗男子的后代，被称作“贱民”。他们的命运更加悲惨，只能住在村外，穿死人的衣服，用破碗吃饭，被蔑为“不可接触者”，受着非人的待遇。各种姓之间地位悬殊，界限森严。婆罗门为永保自己的特权地位，还编造了种姓制度形成的神话故事。相传，宇宙万物都是对千首千眼千足的造物普鲁沙的切割而产生的，四个等级也不例外。当诸神分切普鲁沙时，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王族”，即后来的刹帝利，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他的双脚生出首陀罗。所以，婆罗门居于四种姓之首的地位，便是神的安排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刹帝利日益富有，并在军事和政治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不满婆罗门的种种特权，要求在宗教和社会等级中居于最高的支配地位。这时吠舍中也有许多人变成了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土地占有者，上升到奴隶主阶层。他们对婆罗门至上的社会现象十分反感。首陀罗等下层群众，由于战争频繁、生活艰苦，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如此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映到思想领域便使反对传统的婆罗门教的各种思潮应运而生。

悉达多从小就爱沉思冥想。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和许多社会现象更引起了他的感触和深思。¹⁴岁那年，有一次他出城郊游，看见农民头顶烈日，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地犁田，拉犁的老牛，颈上被绳子勒出道道血痕，还不时地受到农夫的鞭打；田地里犁翻出的小虫，鸟儿争相啄食。站在田边的公子王孙们，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此情此景。他心头一震，凄楚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他再也无心游山玩水，匆匆赶回宫中，静坐一隅，思忖着如何解决旅途所见的残酷事实。以后，他又遇到了年迈力衰、行动迟缓的老人，痛苦呻吟的病人，亲人哭泣送葬中的死人。他的马夫告诉他，这些无常的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命运。这一切使他深深感悟到人生的短暂和苦难，促使他寻找解脱世人苦痛的办法。然而，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他陷入了无限的感伤和苦恼之中。迷惘之中，在北门外遇见了一个出家的沙门（修道者），向他讲述了出家可以解脱“生、老、病、死”的道理，使他幡然醒悟，并萌生了出家的念头。父王为断绝儿子出家的意念，在悉达多¹⁶岁那年，为他娶了邻国公主输陀罗为妻，后来生下儿子罗睺罗并且还为他修筑了“寒（冬季）、暑（夏季）、温（雨季）”三时宫殿，以太子待之，着华贵衣裳，食美味佳肴，整日歌舞于庭，极尽享乐之事。就是这样，也不能拴住他的心。²⁹岁那年，他不顾父亲的劝阻，舍弃王位，毅然辞别亲人，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入深山出家了。

悉达多南渡恒河，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拉志吉尔），在该城附近的山林里找到了隐栖于此的阿罗逻·迦罗摩和郁罗迦·罗摩子老师，向他们学习禅定。这是一种使意识进入到静虑状态的功夫。他虽学到了，但仍不能解决人生解脱的问题。他告别了老师继续寻道，来到了伽蓝山的苦行林。这里树木幽深，河水清澈，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在苦行林里，为消除肌体里多余的东西，他想方设法折磨自己，从食很少的食物到每日只吃一粒米；他穿粗糙的衣服，以棘藜当床，甚至吞食草和粪便，与死尸同睡。如此苦行六年，变得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毛发脱落，犹如一棵枯树；长时间的饥饿，肚皮贴着了后背，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仍不能证得觉悟，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于是到附近的尼连禅河中沐浴，洗去了全身的污垢，开始进食，牧女送来了鹿奶，让他调养身体。恢复元气后，他来到菩提伽耶（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约 10 公里处）的一棵毕钵罗树（即菩提树）下，结跏趺坐，这是佛教中修行者的坐法，即双足交叠而坐，经数日数夜的静思冥想，在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其精神世界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感觉已摆脱了视听的影响，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观念也已不复存在，心平如镜，进入了一种绝对清静的境界。众生由于业行而在不停地生死轮回，犹如现代放映电影一样，在眼前一幕一幕地掠过，他终于明白了人生受苦的根源和解脱苦难的方法。此时的他，一切疑惑全无，顿悟一切真理，成为大彻大悟的觉者，得道的佛陀，简称佛。由于悉达多出身释迦族，故被称为“释迦牟尼”，他的弟子出于对他的尊敬，称他为“世尊”或“班特”，即“主”之意。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菩提伽耶，成为印度佛教的圣地。这里有据说始建于阿育王（约前 273—236）时的大菩提寺，寺西侧有一枝叶繁茂的大菩提树，树下有一金刚座。相传释迦牟尼就是在这棵树下的金刚座上成佛的。近代曾在此发现五方汉文碑刻，均属宋前期的作品，是当时游历印度的中国僧人所立。五方碑刻现存加尔各答博物馆。

释迦牟尼悟道成佛，时年 35 岁，从此开始了长达 45 年的传教活动。他离开了菩提树，来到了波罗奈城外的鹿野苑（今印度北方邦瓦腊纳西西北约 10 公里处），向曾与他一起苦修的五位同伴宣讲佛法，五人皈依了他，成为佛的最初弟子。这是他成佛后第一次说法，佛教称为初转法轮。鹿野苑也因此成为佛教的又一圣地。此地亦称仙人论处、仙人鹿园等。唐代著名僧人玄奘西行求法时曾到过这里。那时，此处十分兴盛，“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卷七），后来逐渐荒芜，只有几处遗址幸存。继五弟子之后，他还说服他的很多亲属入教，如堂弟提婆达多、儿子罗睺罗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许多婆罗门教及其他教派的信众也都皈依了佛门。

佛陀主要在恒河流域的中印度传教，传教对象不拘一格，包括婆罗门、沙门、国王、大臣、商人、手工业者、渔民以至妓女、盗贼等各种姓、各阶层的人们。传教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如讲故事、打譬喻、直接叙述、对话问答等。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布道，并且规定，一定要用当地方言传教。由于传教方法得当，佛陀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释迦牟尼在传教过程中，创立了僧伽（僧团）这一佛教组织。僧伽始于佛陀鹿野苑初次说法，随着佛教的传播，僧伽队伍逐渐扩大，起初只招收男弟子。称比丘，后来，他的姨母也是他的养母摩诃波阇提入教后，才开始接纳女弟子，称比丘尼。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僧伽制度，以保证僧团的纯洁，避免与世俗社会的法律秩序发生矛盾。规定了公职人员、奴隶、罪犯、负债者、盗贼（悔过的除外）、残疾人、病人、未满 20 岁者以及未经父母允许者不能加入僧团的戒律。不过，也有例外。当时最强大的摩揭陀国的国王瓶沙王（频毗沙罗，前 544—493）就作了佛陀的居士弟子；国王之子阿阇世（前 493—462）杀父自立，篡夺了王位，也被佛陀收为“弟子”。看来，佛陀在招收弟子方面还是很有“灵活性”的。

最早的僧团以云游乞食为生，无固定住所。后来，在僧众的所在地，建立了僧院。僧伽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在衣、食、住、行及礼仪、用具、医药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要

求全体僧团成员共同遵守。

为弘扬佛法，佛陀除了接受出家弟子，还接受在家弟子。凡遵守戒杀、盗、淫、妄语、饮酒等“五戒”的俗人，都可以成为佛弟子。随着在家弟子人数的增多，不仅壮大了拥护佛教的社会力量，而且他们的布施也为僧团的活动提供了经济来源。

对于他所开创的宗教事业，释迦牟尼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化度众生中度过的，晚年积劳成疾，在带领弟子们游化的途中患了重病，此时他已是垂暮之年的老者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便开始安排后事，告诫弟子要依法精进修行，最后来到拘尸那城（今印度北方邦的哥拉克浦尔附近）的娑罗林，在两棵娑罗树之间拉好绳床，头朝北，枕右手侧卧。这时有一个叫须跋陀罗的沙门赶来求教，佛陀为之说法，使他成为最后一个亲传弟子。半夜时分，佛陀双眼闭合，神态安详地入灭了，亦即涅槃，终年 80 岁。北京香山卧佛寺的大卧佛，据说就是释迦牟尼逝世时的姿态。

②佛教的基本教义

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继续传播，成为当时一个新的有势力的宗教。之所以如此，与它所宣传的教义是分不开的。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等。

佛所说的“四谛”，即四个真理，包括“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指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苦字，其中有生、老、病、死之苦；还有不得不与其所憎恶的在一起所产生的“怨憎会苦”，不得不与所喜爱的分离的“爱别离苦”，物质上和精神上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求不得苦”，以及“五盛阴苦”，也称“五蕴苦”。所谓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色指身体，受、想、行、识指精神。佛教认为人是由五蕴和合而成的。五蕴之苦也就是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总之，苦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地束缚住人的一生。人为什么会受苦？“集谛”就是说明一切苦的原因的。佛教认为“苦”在于欲望。人有了贪、嗔、痴的欲望，就有行动，有行动就会造业，前生的业，决定来世的果报，于是不免受轮回之苦。“灭谛”则说明必须消灭一切欲望，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而要达到寂灭、解脱，就必须修道，即“道谛”。

佛教教导人们修道有八种正确的方法和途径，称为“八正道”。它们是：正见，即正确的见解，也就是说要坚持佛教四谛的真理；正思维，也称正志，即根据四谛的真理进行正确的思维；正语，即言语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妄语、绮语、恶口、两舌；正业，正确的行为，不作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正命，按佛陀的教导过正当的生活；正方便，亦称正精进，即全力以赴地修行佛法；正念，要有正确的意念，不忘四谛真理；正定，即正确的禅定，专心致志地修习佛教禅定，清除一切邪念，以进入清净境界。

佛教的“四谛”学说，基于“缘起”，它贯穿于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中。“缘起”也称“缘生”，是“因缘生起”的略称。佛教认为，诸法由缘而起，“缘”，意为条件或因果关系，即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最早的缘起说，主要是解释人生痛苦的原因的。佛将人的一生划分为十二个环节，称“十二因缘”。首先是“无明”，即无知，不懂佛理，以此为缘引起了“行”（意志和行为）、“识”（个人精神统一体）、“名色”（精神与肉体）、“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触”（接触外界事物）、“受”（苦乐等感受）、“爱”（贪爱、爱欲）、“取”（追求执着）、“有”（产生“业报”的各种行为的总合）、“生”、“老死”。十二个环节依次递进，一环套一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由此可以看出，要想摆脱“生死”，就应消除“无明”，也就是说要相信佛的说教。

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可以看出，佛教以“轮回业报”为其理论基础，将摆脱痛苦作为人生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即解脱的唯一途径是涅槃。涅槃是梵文 *Nirvāṇa* 的音译，汉文意译

作“入灭”、“灭度”、“寂灭”或“圆寂”。它的原意是指火的熄灭和风的吹散,佛陀认为,众生经过长期的修行,就可以熄灭生死轮回而达到神秘的精神境界。按照《杂阿含经》卷十八的解释,“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达到涅槃,也就达到了佛教的最高理想。

③佛教的经典

佛教的经典为经、律、论三藏。“藏”的原意是一种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筐。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为佛陀本人生前的说教;律是他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及对这些规则的解释;论则是为了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也有了汉译佛经。三藏,即佛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以后称“大藏经”。中国大藏经是世界佛教史和文化史上最有影响和最有价值的文献。

大藏经按语系,一般划分为三大系统:巴利语系,主要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等少数民族地区;汉语系,流传在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藏语系,流行于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西伯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佛教的经典是在释迦牟尼逝世后,经过四次结集而形成的。结集,按梵文的原意是僧众大会的意思。这里主要指在佛陀去世后,为弘扬佛的说教,由一些最有学问的僧人集会,背诵经典,经过讨论、甄别、审核,取得共识后,作为佛的说教用文字确定下来。这一过程称为结集。一般认为,在佛教史上先后共有四次结集。第一次是在佛陀入灭后三个月,以其著名弟子大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结集,共同忆诵佛的说教,定下了后来三藏的雏型。其后,在释迦牟尼逝世 100 周年时,在跋祇国首都吠舍离(今印度比哈尔邦,木扎法普尔县境内)举行了第二次结集;在阿育王时代,于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市),由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主持了有一千比丘参加的第三次结集;在贵霜帝国迦腻色迦统治时期(约 78—102),于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举行了五百比丘参加的第四次结集,对经、律、论进行了注释,并首次把巴利语三藏辑录成册。通过四次结集形成的佛经,被佛教徒视为神圣的经典。

④佛教的派别

大约在佛陀逝世 100 周年时,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的理解、认识不同,开始分裂。最初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部派,称根本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陆续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根本二部在法理及对佛陀的认识等问题上,分歧很大。譬如在对佛陀的认识上,上座部认为佛陀也是人,因此他肉身和寿命与普通人一样,是有限的、有边际的;所不同的是佛更聪慧、思想更正确,理想更崇高,并具有发现真理的特殊天才,正因如此,众僧才将他视为自己可尊敬的导师。大众部则强调佛陀的神性,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他有无量的威力和无际的寿命,并以一音说一切法。上座部与大众部之争不分胜负,但大众部的说教则为以后大乘教派的崇佛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部派佛教流行时期,约当公元一世纪左右,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大乘佛教。“乘”有“乘载”之意。大乘佛教把自己比作一条大船,可以运载无量众生抵达菩提涅槃的彼岸,为抬高自身地位,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为“小乘”。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小乘佛教继承了上座部的说教,注重个人修行,追求个人自我解脱,所理想的极果为阿罗汉,这是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即最高成就。得到此果位就再也不遭受“生死轮回”之苦。阿罗汉,简称罗汉。大乘佛教则主张“普渡众生”,即使众生都得到解脱,所理想的极果是佛果。大乘宣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有无数佛,其数量如恒河的沙子,数也数不清。任何人,只要虔诚信仰,不必出家苦行,都可成佛,并认为佛果高于罗汉果。大乘还创造了一个仅次于佛果的

菩萨等级，认为佛有许多化身，积多世功德得入“涅槃”的人可以暂时不入，下降尘世，超度众生，称为菩萨。据说，释迦牟尼未成佛时，曾以菩萨为称号。追求自我解脱和强调普渡众生，是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最显著的区别，此外，在对待释迦牟尼的态度上，前者视其为教主，后者则注重佛的神性；在义学上，前者主张“我空法有”，后者宣扬“法我皆空”。值得一提的是大乘和小乘后来一直为学术界沿用，并无褒贬之意，但后者不接受“小乘”称号，而自称“上座部佛教”。

⑤佛教的传播

佛教最初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公元前 4 世纪后期，开始了印度历史上的孔雀帝国时期（约前 324—185）。帝国的第三代国君阿育王，是世界文明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在位 40 多年，继承先王，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征服了南印度的海上强国羯陵伽（今印度奥里萨邦），除半岛南端外，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阿育王的残酷屠杀政策，在对羯陵伽的征服中达到极点。其铭文自称“俘十五万人，杀十万人，死者数倍”。腥风血雨过后，他又戏剧性地宣称感到后悔，深深谴责自己嗜杀成性的残暴行为，承认灭生灵，掠人作俘乃重罪与暴行，表示要以“法的精神”代替“激战的鼓声”。于是，在优波鞠多的感化下，皈依了佛教，成为佛教的最大护法，使佛教在其统治时期盛极一时。这可说明阿育王在建立了幅员广阔的孔雀帝国之后，他已不单纯依靠武力进行镇压，而更注重以“精神”统治其臣民了。

阿育王极力推崇佛教，奉其为国教。他还大力兴建佛教寺院和佛塔（窣堵坡），建造了八万四千塔。据佛教传说，某日，佛陀与弟子阿难游行来到居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遗址在今印度北方邦东北的拉普底河畔），沿街乞食，见一群小孩在路边游戏，他们用土建造华丽的宫殿和巨大的仓库，其中一个见佛陀走来，非常高兴，于是以土代替谷物布施于佛。佛接受布施后告诉阿难：“此子在我涅槃后当做国王，为我起八万四千塔。”看来，佛陀的预见性是很强的。阿育王为他造这么多的塔，也是他积多世功德所得的果报。

为扶植佛教，使其成为他进行统治的精神支柱，阿育王于公元前 256 年发起并派人主持了佛教的第三次结集。之后，派僧徒走出印度，分赴周围国家传教，最远的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地。从阿育王时代开始，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三次结集后，阿育王派王子摩哂陀等传教师到斯里兰卡传教，再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由于是从印度向南传播，所以也称南传佛教。南传佛教主要是小乘，即上座部佛教。一条路线是由印度向北传出的佛教，称北传佛教。大、小乘曾北传，但流行广，影响大的是大乘，也就是说北传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它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又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2. 汉地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经过初传，普及，逐渐成为一种中国民族宗教。在教理和组织方面，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学派和宗派。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艺术，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佛教在汉族地区的传播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汉地，众说不一，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中国的佛教徒出于宗教感情，总是希望教史越早越好。他们著书立说，在谈经论道的同时，也撰写了种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

相传，阿育王一日之内建造八万四千塔，使佛舍利遍及阎浮提，阎浮提意指整个人世间，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于是乎，阿育王塔遍布“汉土九州之内”，齐晋之地皆有阿育王寺。阿育王是公元前 3 世纪的人，但编故事的人把他提前了二百多年，即佛陀在世时佛教已传入中国。

也有人说，佛教是秦始皇时传入中国的。据说，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 18 人，

来到咸阳，向皇帝奉献佛经，劝他皈依佛门。始皇不仅拒绝，还将他们囚于狱中。没想到半夜时分，六名金剛大力士犹如天降，破狱救出贤者。始皇帝惊恐万分，慌忙跪地叩首求饶。史载，秦始皇与阿育王是同时代人，而阿育王在三次结集后，确实曾派僧人外出四方传法，达雪山边国和罽那世界。有人说，后者即为汉地。

以上诸说，或过于牵强，或无遗迹传世，都不足以证实佛教是否在此时已传入中国。

应该说，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这一说法是准确的。

史学和佛学界一般认为，佛教是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徒四方传教，佛教开始在中亚各国传播，西汉时已传至我国龟兹、于阗等地。据佛经传说，阿育王的太子法益遭继母陷害，被挖去双眼，驱逐出国。阿育王将其属地赐予法益，这些属地包括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乃至中国内地，果真如此，则龟兹在公元前 3 世纪就接受了印度佛教。《魏书·西域传》和《大唐西域记》等也记载了佛教初传于阗的传说。相传，于阗国本不信佛法，大约在公元前 80 年左右，迦湿弥罗的毗卢折那罗汉到于阗传扬小乘佛教。毗卢折那在王城南的树林中，宴坐习定，请佛显灵，围观者见其容服、举止非等闲之人，便将此事禀报于阗王，王闻之赶来观看，罗汉乘机说法，宣扬“如来慈悯四生，诱导三界”，“遵其法者，出离生死”，并劝曰：“王建伽蓝，功成感应。”（《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王遵罗汉之意，在王城南十余里建大伽蓝。寺建成后，王诚请佛至，只见佛像从天而降，授王键椎，以扣击召集僧众。从此，于阗王诚信佛教。此外，城南五十余里的赞摩寺，也是昔日毗罗施罗汉初传佛法的地方，寺中有一石，还留有“辟支佛趺处双迹”。（《魏书·西域传》）。

公元前 138 年至 126 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停留近一年，见到了从印度运去的蜀布、邛（今四川西昌附近）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很可能印度佛教徒也随之进入汉地。汉武帝还开通了中印交往的海上航道，和印度东海岸的黄支（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建立了联系。汉武帝通西域和海上交通的开辟，无疑为佛教东渐创造了条件。

近年考古发现，四川彭山、乐山的东汉崖墓中已有佛像。现藏南京博物馆的彭山崖墓摇钱树陶座佛像，于抗战时期出土，陶座全高 20.4 厘米，所雕佛像结跏趺坐，左右侍二人，著名学者俞伟超先生认为这是“一佛二菩萨”，中为释迦，两侧为大势至和观世音菩萨。乐山麻濠崖墓佛坐像，高 37 厘米，着通肩大衣，形态与彭山佛像相仿。据专家们考证，这些标准佛像当为东汉末年的作品。另外，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有关专家认为，与彭山崖墓佛像属同一时期的作品。相传，孔望山是孔子来过的地方。当年，他登此山以观东海，故而得名。孔望山佛像，依山凿出，共 105 幅，其中许多可谓佛、道不分，例如其中一幅立像，头有佛光缠绕，着圆领上衣，束腰带，穿裤，但右手上举，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与孔望山同期，在距其不远的山东沂南和滕县，也有佛教题材的画像石出土，其中沂南的画像石墓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于 1954 年发掘出来的，画像虽多为道教题材，描述东王公和西王母等神话传说，但其中也有佛教人物形象，如墓室石柱顶端南北两面各刻有一个神童，以带结发，并有一圆圈如佛光环头；在南面神童的下方、柱子的中部，有一结跏趺坐的羽人，肩生双翅，作施无畏印，是个带有道教色彩的佛像。从四川、江苏、山东等地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至东汉后期，佛教已在汉族地区流行了。

佛教在官方流传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与汉明帝为同父异母兄弟，其封地在今徐州市及其附近地区，东距孔望山约一百多公里。此人少年时好游侠，广交宾客，晚年喜黄老学说，对佛陀亦感兴趣，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楚王英惟恐自己所为有失人臣之礼，便派遣郎中带上黄缣（细绢）白纨（薄绢）三十匹来朝廷赎罪。明帝听

报此事，即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于是退回所奉缣帛，好让他以盛宴供养沙门和伊蒲塞（居士）。汉明帝以诏书宣示各王，可见当时朝廷不反对佛教。由此推断，汉明帝永平八年以前，佛教已在民间流传了。

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派佛教信使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但究竟传的什么经，于史无证，只是传闻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信奉者还不是很多。但汉明帝感梦求法之事就不同了。与汉明帝诏书褒奖楚英王同时，忽一日，岁星昼现，西方夜明，帝梦一金人，身長丈六尺，项佩白光，飞行在殿庭。第二天一早，汉明帝询问群臣，博士傅毅奏道：“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轻举能飞，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罢，即派遣蔡愔、秦景等 18 人出使天竺，问佛求法。行至大月氏，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得佛画像和佛典。永平十年（67），汉使梵僧一同返归洛阳。一路上，他们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抵京都洛阳后，二位僧人受到汉明帝盛情接待，让其暂住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第二年，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之北修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也因二位高僧曾下榻于鸿胪寺，所以称新建的僧院为白马寺。以后，“寺”成了我国僧院的泛称。白马寺则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成为中国第一古刹。摄摩腾、竺法兰在这里翻译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此后，许多僧徒相继在此翻译佛经。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的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祇戒心》。

如今，已有 1900 多年历史的白马寺静卧在陇海铁路北侧一片郁郁葱葱的古木丛中，寺中殿阁和宝塔隐约可见，给人以肃穆、神圣之感。据传，该寺仿印度祇园精舍而建，砖塔、殿阁错落有致。岁月沧桑，现寺内建筑、雕塑、碑刻等多为明清遗物。唯寺东南的齐云塔，又名“释迦舍利塔”“白马寺塔”，是金大定十五年（1175）重建的。据寺内藏存的一方宋碑说，这是一座密檐式的四方砖塔，共十三层，高约 25 米，初建于东汉永平十年（69），享有“中国第一古塔”的美誉。现存的白马寺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后遗存下来的，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特色。步入山门，沿中轴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其中天王殿和大佛殿的殿壁间镶嵌着一种罕见的梯形砖、石，可能是东汉遗物；在中轴线两侧，还有一些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的附属建筑。白马寺后面的清凉台，以砖砌成，长约 43 米，宽约 32 米，高约 6 米，其面积仅为初建时的 1/3。毗卢阁就建在台上。相传清凉台曾是汉明帝乘凉读书之处，后为摄摩腾、竺法兰译经传教之所。至今，在毗卢阁的东西配殿内还供有二位高僧的塑像。在白马寺东南角钟楼和西南角鼓楼旁边，各有一座用弧形青石垒砌的圆形墓冢，据说是中国佛门开山始祖腾、竺二僧圆寂之处。相传北宋淳化年间，干旱无雨，宋太宗赵光义命人至二位高僧墓前请雨，墓开之后，只见他们“仪貌如生”，顷刻便“甘霖普降”。这则美好的故事道出了后世禅门弟子们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在白马寺西南，有“焚经台”遗址。相传白马寺落成不久，道士贺正之、费叔才等上表汉明帝，斥佛虚诞，要与之一比高低，于是明帝下令在寺山门外筑二高台，东台放道经，西台放佛经，用火焚经，以辨真伪。结果道经很快化为灰烬，佛经真金不怕火炼，且发出五彩祥光。这虽为荒诞之说，但反映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初传时的佛、道之争，以及依靠封建上层统治者弘扬佛法的传教方针。当我们漫步在白马寺内，抒怀古之幽情，叹人世间的风云沧桑之时，请不要忘记伫立在山门外两侧的一对白马，当年“西天取经”，它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作为佛教的“卫道士”，仍在恪尽职守。屹立于邙山洛水之间的白马寺，至今仍钟磬相续，香火不绝，以它古老悠久的历史，于 1961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四十二章经》之后，兴起佛经翻译之风，至东汉末，中国学者也开始从事自己的佛学研究。儒生牟融，本为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人，博读经传，也读神仙家之书，但以

为荒诞不可信，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后，中原大乱，南逃交趾（今越南北部）避乱。此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致意于研究佛学，兼习老子，开始由儒转向佛，随着对佛教信仰的愈加强烈，终于执笔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于东汉末年，汉献帝时，写成《理惑论》三十七篇，是为中国佛学的第一部论著。他在书中，旁征博引，论证佛、道、儒的一致性，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上可以看出，大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以汉明帝“永平求法”作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汉代是佛教的初传时期。所传地区以中原的长安、洛阳为中心，向西达四川的彭山、乐山等地，向东传至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一些地方。据《后汉书·陶谦传》载，陶谦于汉献帝初平四年（193）任徐州牧，任职期间，派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笮融到广陵（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今徐州市）督运粮草。笮融借机在这些地方大起浮屠祠，寺内供奉的佛像以铜铸成，外涂一层金粉。佛的衣服也很讲究，以锦缎制成，光彩耀人。寺院规模很大，可容三千人诵读佛经，吸引周围数以万人前来观佛像、听授道。每当此时，寺院还设酒饭款待好佛者。可见，佛教在这些地区的百姓中已相当普及了。佛教初传时，是与神仙方术连在一起的。这不仅表现在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和孔望山摩崖刻像中，而且上层统治者也将黄老与浮屠并提。楚王英，这位皇族中的始信佛者，曾“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视沙门同方士。东汉末年的汉桓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败国皇帝。他一生横征暴敛，“亲小人，远贤臣”，荒淫无度，酒色伤身，只活了36岁就寿终正寝了。为保住王位和生命，他不惜求助各路神仙，无论此神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为企望福祥，便一一拜托了。汉桓帝曾两次派人到老子家乡苦县（治所在今河南鹿邑东）祭祀老子，并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将黄帝、老子、浮屠同祭，认为老子和浮屠都主张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甚至还编造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谣言，以抬高道教的地位。佛教徒虽明知佛理有异于黄老之说，并对老子西行教化胡人之说耿耿于怀，但为使佛教挤入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殿堂，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得屈尊一时，以黄老之徒默许，并入境随俗，投其所好，小施魔法，以取悦当权者，吸引广大信众。汉桓帝、灵帝时，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华译经。他刻苦好学，博览经籍，“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高僧传·安清传》）。他精通汉语，除翻译大量佛经外，还到丹阳、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广州等地传经说法。相传，他到广州时，当地寇贼横行，行路中，遇一少年，满脸杀气，举刀狂吼：“我要杀死你！”安世高笑着说：“我命里注定有负于你，所以才远道赶来偿还，看你这怒气冲冲的样子，就因我前世欠下你的。”说完，把脖子伸到刀前，脸上毫无惧色。持刀少年即将其头砍下。围观者挤满街头，无不为之惊骇。但转眼间，天神显灵使断头重植于脖子上。这显然是安世高事先安排好的迷惑观众的小把戏，可是百姓们却信以为真，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佛教的印象。汉代佛教初传时期，因其形式和内容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加之异国文化的差别，传播时的阻力是比较大的，只好借助黄老之说，神仙方术之道，为自己的传播创造有利的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借儒玄之说，翻译经典，阐发义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中，逐渐发展成汉化佛教。佛教在传播中，不仅继续取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而且加强了同文人名士的联系，以某些中外著名僧人为中心形成的佛教社团，成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源流。

首先，佛教借助儒玄学说，逐渐发展成汉化佛教。

玄学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取自老子《道德经》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其中写到，“有”和“无”二者构成了“玄之又玄”。在玄学研究中有“三玄”之说，老子、庄子、《易经》（及其哲学附篇）各为一玄。玄学的始创者为曹魏王朝时

期的何晏（190—249）和王弼（226—249）。他们都注释了《道德经》、《易经》和《论语》，其中何晏所注《论语》和王弼所注《易经》和《道德经》流传至今。此外，他们对《庄子》也很熟悉。何晏出身于贵族之家，他的母亲是曹操的一个妾，因此被收养在宫中。后来他娶曹魏的一名公主，即他的同母异父妹为妻，成为一件丑闻。他潇洒俊美，文雅多情，是个奶油小生，同时也是个浮华、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他喜欢黄老之学，颇善“清谈”，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官至尚书。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大将军曹爽，何晏也被处死。王弼是何晏的朋友，也是世家大族出身，自幼聪慧，后经何晏推荐当上了尚书郎。他们都强调儒家学说，尊孔子为圣人，但又是追求自由、非正统的知识分子。既要恪守儒家信仰，又要追求道家的自由意志，介于相互牴牾的二者之间，产生了对二者进行调和与妥协的新思想——玄学。何晏、王弼虽思想相近，但后者的哲学思辨才能要比前者高得多。他在“清谈”中学会了运用辩证法，他的思想主要以“有”和“无”为基础。在这里，“无”是现世的根源，是宇宙的原始状态，是“有”的基础，万事万物由此而生，“天地虽广，以‘无’为心”。“无”可以比作“理”，是主宰一切的。“有”是实际应用，亦称“体”，也就是“无”的作用。“无”和“有”是静和动、寂静和行为主义的对立统一。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表示既要参与社会生活，又要退隐林泉；既要受命于国家，又要宣扬遁世主义。

一个人若从“无”中吸取灵感，他的行动就是无心、无爱憎、无为的。但圣人不是“无情”的。他和普通人一样，是有情的。只是比别人更富于“神明”，就像大乘佛教那样，“是要通过情本身来逃避情”。由此可以看出，玄学既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又要最大限度地宣传它的“贵无”主张。

魏晋时期，战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文人名士往往托言老庄，崇尚清谈，以避是非。此时佛学理论亦开始系统化，当时流行的般若学说，主要宣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的观点。这与阐发有无关系，重“贵无”的玄学正好相符合。玄学与佛理，一个谈无，一个讲空，二者相得益彰，使佛学在玄学盛行的魏晋时期得到新的发展。

西晋战乱，大批名士（玄学家）纷纷过江，许多佛教僧人也随之南下。无论名士或僧徒，都有一个共识，即用一套旧的说法去江东，恐怕是找不到饭吃的。为了生存，尤其是外来的佛教，要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主张空无的玄学，正好迎合了佛学的说教。为了佛教在中国的勃兴，南北佛教僧徒都很重视研习老庄学说，以老庄的词汇和义理来解释佛理，他们既是佛教名僧，又是玄学清谈的名士。而玄学名士们也乐于与名僧交往，共谈玄理，切磋大乘佛典。从而形成了魏晋时期佛、玄合流的思潮。佛玄合流，反映了外来的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认归。

“托怀玄胜，远咏老庄”是高僧与名士彼此联络、交往乃至互为知己的基础，许多僧人还在生活习俗、语言、气度等方面模仿名士。他们诵经时是佛徒，聚会时又成了不务世事的清谈名士。河南居士竺叔兰，祖籍天竺，父辈避难居于河南。此人幼时学经，懂胡、汉两种语言，并通文史，但性格浮躁，善猎好酒，经常于酒后寻事。有一天，他醉倒在路边，起来后又去府门闹事，人家要把他送往监狱。这时，府门的尹乐广正与客人共酣，醉意中，尹问竺：“你是个侨客，为什么学人饮酒？”竺答：“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以侨究？”一旁的客人说：“外国人的脸怎么那么白呀？”竺答：“河南人面黑都没有怀疑，我面白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宾主见他如此机敏善辩，就把他放了。

僧人们在待人接物时，言语诙谐，应对得体。有个叫康僧渊的僧人，祖上是西域人。他长得像西域胡人，说起话来却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东晋丞相王导（公元276—339年）以其高鼻深眼而戏之。却遭到了他巧妙地回击说：“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言语篇》）真可谓能言善辩。

除言辞外，僧人们也像名士一样，讲究气度。当时，名士们都以长啸低咏来表示自己的

高雅放达和清高。他们还能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和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统一起来。僧人帛尸梨密多罗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来到中国。他结交的名士中，有个叫周顗的，被人害死，帛尸梨密多罗前往吊唁，他时而以梵音诵唱佛教颂歌，声音响亮而有韵律，时而放声大哭，但颜色不变，忽然间，挥涕收泪，神气自若。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许的名士气概。

佛教僧与名士的交往，虽有志趣相投的一面，但并没有忘记借助玄儒学说，弘扬佛法的初衷。这方面的杰出者当属支遁（314—366）和慧远（334—416）。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东晋名僧。他出身在一个皈依了佛教的书香之家，自幼读经，25岁出家，虽为北方人，但一生主要在南方度过。他毕生与清谈名士志趣相合，以好谈玄理而闻名，喜好养马放鹤，赋诗写字，常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深得名士的推崇与赏识。他身为出家人，却很少住在寺里，经常在余杭山间隐居。他对《般若经》很有研究，自认为从中找到了“至无”，使“无”和“有”的对立得以解决，并将“至无”比作佛学的般若（智慧）。他写下了《即色游玄论》，以此创立了般若学，提出了“即色本空”的思想。在他看来，一切现象皆无自性，都是假的，因此是空的。在这里，色就是空，玄则指空无，即色游玄，就是即色游空，由此即可逍遥。不过，逍遥不必脱离世俗，只要不为物累，保持心理上的超脱，即可达到逍遥。《即色游玄论》是佛学与玄学相结合的产物，支遁因此成为当时的名僧与名士。另外，他所注的《庄子·逍遥游》，使“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东晋后期，儒学又逐渐取得传统的地位。慧远顺应潮流，将儒家的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联系起来，以佛融合儒玄，使佛教有了新发展，开始取得自立地位。

慧远是东晋著名高僧，南方的佛教领袖，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据《高僧传·慧远传》，他俗姓贾，雁门楼烦人（今山西省代县）。年少时就“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成年后，从当时名僧道安（公元314—385年）于恒山寺中出家，与之学习《般若经》。经过学习，他不仅“豁然悟”，而且发出了“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感叹。他24岁就能登坛讲说佛经，是道安的得意门生。道安曾将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希望寄托于慧远。后来，慧远离开道安到南方传教，途经庐山，见此地秀美清静，便卜居庐山³⁰余年，孜孜为道，直到老死。他拒绝了朝廷一再征召和京师附近的显贵们的再三邀请，以超世绝俗的姿态，排除了统治者的担心，赢得了僧俗的尊敬，于乱世中维护了佛教的独立性。

佛教称自己为“内道”，儒、道等为“外道”。慧远于佛宗“般若”，于儒精《周易》、《毛诗》、“三礼”，于道擅《庄子》、《老子》，以其“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精湛造诣，吸引人们上山来拜访他，使他与南北名僧、统治者和上流社会都有交往，聚徒讲经，弘扬佛法，将庐山经营成南方佛教中心，他自己也成了佛教界领袖。在传经说法的过程中，在慧远周围形成一个崇拜阿弥陀无量寿佛的社团，发誓要往无量寿佛的极乐净土里去，因此后来的净土宗奉他为初祖。

慧远身居山林，潜心研究佛理，强调“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进而提出“佛儒合明论”，将儒家的《孝经》和中国传统观念同佛教的基本理论因果报应说融汇贯通，以儒释佛，使西天的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为接近。慧远认为，由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在家应孝敬父母，将中国传统的忠孝思想同佛教的轮回造业联系在一起。再如，“福善祸淫”，“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等中国传统观念，也是出于同一道理。慧远在他作的《明报应论》、《三报论》中，一方面借中国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神明不灭的思想，阐明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从而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将个人行为的善恶作为因果报应的原动力，而把人生苦难的社会原因归于主观自身，这种说教的社会效应对百姓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对统治者也是一种警戒，但在客观上对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保持社会稳定，是有益无弊的。

一言以蔽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借助儒玄学说，开始将印度佛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逐渐发展成汉化佛教，为唐代佛教的全盛打下了基础。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存在着南北佛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佛教各派大体上都已传入中国，僧徒们各就所学，潜心钻研，聚徒讲经，成立学派，为隋唐时期各宗派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此间，南北环境不同，南方基本上沿袭汉族的文化传统，北方则由于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而形成了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发展趋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南北佛学的差异。南朝注重佛经义理的研究，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南朝梁武帝（464—549）时来华的天竺僧人真谛（499—569）。这位大师于546年来到广州，随身携带240捆梵文贝叶经，从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译经生活，最后病逝于广州。他在中国共译出各种经论49部140卷，这在同时代及后来的译经者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他将最新的大乘唯识学说介绍给中国，并使中国人接受和吸收了这一崭新的印度哲学思想，并对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所谓禅，就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消灭一切妄念，一心一意求解脱。也就是说，头脑中不能有任何杂念，念佛修禅定，以求往生乐土。念有心念和口念之分。无论是用心还是用口，都是念佛的名号，相（形状）好、光明、神通和功德等等。念佛的目的是为了求福。另外，建寺院、凿石窟、造佛塔等也是念佛的表现。总之，与南朝相比，北朝佛教一是侧重禅学，主张寂坐修心，不重讲经；二是强调发扬佛教的形迹，后者对佛教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北朝时期，总的说来，历代皇帝都扶植佛教。南朝宋、齐、梁、陈各国国君大都崇信佛教。南朝时，佛寺大增，仅就建康（今南京）一地，东晋时为37所，梁武帝时增至700所。不仅如此，许多寺院还立有高十余丈的金属铸成的佛像，至梁武帝时，佞佛达到极点。武帝原是父祖相传的道教徒，做皇帝后，于天监三年（504）皈依佛门。梁武帝在位48年，是南朝统治时间最长并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他多才多艺，文武双全，有丰富的统治经验，重视在中下层士族中选拔人才，注重吏治，强调“官以人而清”。他在位时，梁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较高的发展。

同时，梁武帝又是一个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自称“三宝奴”（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三次舍身入寺。所谓舍身，就是将自已的财产及自身舍给寺院，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当奴隶。梁武帝第一次舍身是在大通元年（527），时年64岁，第二次是中大通元年（529），第三次是太清元年（547），当时他已84岁高龄。三次舍身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一次4天，第二次16天，第三次37天，被称为“皇帝菩萨”。每次都是群臣花巨额钱币将他赎回宫中。

为扩大佛教的声势，抬高佛教的地位，梁武帝大建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他敕建的同泰、大爱敬、大智度、法王、仙窟和开善等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雄伟壮观。后来，唐朝诗人杜牧曾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来描写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的佛寺盛况。据统计，梁朝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余人，仅京都建康就有大寺700余所。此外，寺中还建了大量金、银、铜、石佛像，有的立像高达百尺。梁武帝还多次在同泰寺为僧俗信众讲说《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和《金字三慧经》等，以国主的身份，宣扬佛教学说。据说，他还是第一个举办“四部无遮大会”的人。“四部”指僧、尼、善男、善女，这种大会类似印度僧伽每5年一次的大法会。533年举行无遮大会时，有30万人参加，每人都获得了“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食品。法会上，不仅传经说法，还进行驯象等各种娱乐活动。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满足梁武帝祈求功德、造福来生的奢望，但频繁的佛事活动，挥霍了大量财富，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梁武帝还首次在汉地举办盂兰盆会。盂兰盆是梵语，意译为“救倒悬”，意为救度先亡倒

悬之苦。盂兰盆会，亦称盂兰盆斋、盂兰盆节，是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的法会。关于这种法会，还有一个很曲折的故事。据《盂兰盆经》记载，佛陀弟子目连，得六通（六种智慧）时，以道眼看见母亲在饿鬼道中受苦，瘦得皮包骨不说，还形若倒悬。目连非常伤心，即用钵盛饭，以神力送给母亲吃。没想到饭还未到口中，便化为火炭。目连不忍母亲受这痛苦，但自己的神力又救不了她，于是求佛救度。佛陀告诉他，你母亲罪业深重，非一人神力可为，要靠十方僧众的力量，方能救你母亲脱离苦难，并告诉他，七月十五是众僧安居修行圆满的日子，让他在那一天设盛大的盂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十方僧众，借他们的神力使母亲解脱。于是他就这样作了。因目连救母而兴的盂兰盆会，后来便成了佛门弟子们为现生父母增福延寿，为先父母离苦得乐，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好形式。梁大同四年（538），武帝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广修盂兰盆供，民间各界百姓亦效法遵行。此后，中国把农历七月十五日定为“盂兰节”。到了唐代，盂兰盆供普遍风行于朝野官民，不仅盆供奢华，往往饰之金翠，以花蜡、花瓶、假花果树等装点寺院，并有音乐仪仗助盛庄严，倾城欢庆，甚为壮观。宋以后，盂兰盆会逐渐失去本意，转变为以盆施鬼，由孝亲变成祭鬼，并增进了施焰火、放河灯、焚法船的内容，由佛事变成了民间习俗，但目连救母的故事则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并编成戏剧，搬上舞台表演，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梁武帝非常重视佛典的翻译和注疏，应武帝之邀来华的大译经家真谛，译出许多有关印度佛教大乘有宗的著作，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还敕名僧注疏佛经，如宝亮的《涅槃经》疏，建元、僧朗（法朗）的《涅槃经》注等。他曾三次敕编有关佛经目录，其中僧祐撰写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古且较完善的经录，学术价值颇高。武帝本人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梁书·本纪》）。此外，还写了许多关于佛学的论文，如《立神明成佛性记》、《净业赋》等。梁武帝的著作大多已经佚失，留存下来的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

梁武帝在阐发佛学思想中，提出了佛、儒、道三教同源的学说，认为儒、道二教源于佛教，老子、周公、孔子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因此三教中佛教最高，佛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儒、道只能求世间的善，这就构成了佛与儒、道之间的圣、凡之别。三者合一，既可互相贯通，又可相互补充。儒、道教人在世间行善，佛教劝人出世成佛。三教同源未免过于牵强，但三者合用，对于建立稳固的封建统治是极为有利的，这就是梁武帝时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的奥妙所在。

北朝是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时期。一些游牧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羯、鲜卑、氐、羌等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与汉地居民相比，这些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还处于落后的状态，进入汉地后，逐渐由游牧改为农业定居民生活，在向汉民族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开始仰慕汉文化，学习汉文化。

他们虽然倾心汉文化，但对外来宗教却没有汉人那种偏见，其统治者亦都提倡佛教。由羯族建立的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盛时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初次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及其继任者石虎强悍善战，在征战中，烧杀劫掠，竭尽破坏之能事，人称暴君。但他们都信奉佛教。石勒不仅自己信佛，求佛保佑他的子孙，而且还大兴佛事，修建寺院，请西域僧人、道安的师傅佛图澄（232—348年）作他的顾问，奉他为法师。石勒死后，石虎将他的儿子全都杀死，夺取了后赵政权，但对佛图澄却更为尊敬。石虎认为，外族人应欢迎外族人的神，胡人应奉胡神，他作为胡人，就应兴佛教。他允许汉人出家为僧，僧徒虽不得作官，但可以免徭役、兵役和租税。

久居中国西部的氏族，一向重视吸收汉文化，魏晋时汉语成了他们的通用语言。公元352年，氏族苻氏在中国西北建立了前秦国，以长安为国都。苻坚（公元357—385年在位）时，

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国势强盛。苻坚 8 岁开始学习汉文化，提倡儒学和佛学，重视佛经的翻译，他把定居襄阳（湖北）的名僧道安接到京师长安，指导当地僧徒社团成员从事译经工作。道安译经，强调保留佛教原本的印度式的哲学思想，这种作法一直保留到唐代。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东汉时，佛教刚刚踏入中原大地，就遭到了中国传统道教徒的反对。到东晋时，儒、道、佛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减，在斗争中，道教附儒，玄学附佛。儒经讲究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不太论及死后事（鬼神的有无），表现出“未知生，焉知死”，重生轻死的神灭论思想。佛教以“无生”（精神不死）为宗，讲究业报轮回，相信神不灭。儒佛之间，就神灭论与神不灭论这一根本问题以及礼制、华夷等诸问题展开争论。儒佛之争，在东晋，主要为礼制问题。佛教初入汉地时，沙门见皇帝时，不行跪拜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有悖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东晋南北朝时，朝野都崇尚佛教，沙门不跪拜帝王，不仅影响了皇威，也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仪规范，引起了沙门应否向帝王跪拜的争论。晋成帝咸康六年（340），车骑将军庾冰辅朝政，代成帝作诏书，令沙门见皇帝时应行跪拜礼，引起佛教徒的反对。经反复辩论，庾冰失败。元兴元年（402），太尉桓玄秉政，重提跪拜问题，与佛教徒及名僧慧远等多次辩论，慧远写出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小册子，申述佛教徒不行跪拜礼，只是个礼仪形式问题，并非对帝王的大不敬，实际上，僧徒是尊敬和支持王者的。后来，桓玄代晋自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诏令僧徒对皇帝必须行跪拜礼，不遵从者杀，即“**剝断**”，或“**鞭颜皴面而斩之**”。到孝武帝之子，宋废帝时，由于朝野僧徒的激烈反对，跪拜制度被取消。隋唐时，沙门不敬王之争仍时有发生，唐开元二年（714）以后逐渐平息。跪拜王者，对于儒家来讲，是维护根本的伦理道德，对于佛教，则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不肯退步的原因。在这场斗争中，儒家没有敌过佛教的反抗。

南朝宋、齐时，出现道教和佛教的斗争。宋末有个叫顾欢的道士作《夷夏论》，极力诬佛。

《夷夏论》主要论述“舍华效夷，义将安取”？也就是说，汉族人有自己的礼仪习俗，为什么还要仿效外国人的呢？以华夷之辩为重要内容的儒道佛之争，在北朝表现得比南朝更剧烈，出现了魏太武帝（423—452 在位）和北周武帝（560—578 年在位）的灭佛之举。

北魏是鲜卑族人建立的政权。魏太武帝灭佛主要出于政治原因。魏太武帝是北魏杰出的皇帝，他依靠司徒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骠悍善战，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自 304 年开始的十六国之乱，北魏国势达到全盛。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和平与安定，但南方以“不敬王者”为内容的政教冲突，引起了魏太武帝的警觉。当时佛教在北方很受群众欢迎，但它毕竟是“夷教”，为了表明自己亲汉不亲胡，虽然在此之前，北魏王朝一直是左袒佛教的，但魏太武帝采取了排斥佛教的政策。他在灭佛诏令中说：“朕承天绪，欲除伪（佛）定真（儒道），获羲（伏羲）、农（神农）之治”。另外，他的谋臣崔浩是一名道士，他的劝说，除宗教意义外，更主要的是想以此扩大汉人在北魏政权中的势力与影响。

北魏王朝时期，儒、道掀起了反佛教运动。儒以正统自居，认为儒家思想应成为朝廷的统治思想；道教经过寇谦之（365—448）革新天师道（五斗米道），也有了新的发展，与佛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寇谦之是太武帝的顾问。少年时先学道于西岳华山，后又学道于中岳嵩山，遇到一位真人告诉他将为王者师。⁴¹⁵ 年，他在嵩山顶上遇见了老子成神后的影象太上老君，授与他“天师”称号，令其“清理道教”。⁴²³ 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老子玄孙李普文的异象，授予《**策图真经**》60 余卷和劾召鬼神等法，并告诫他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太武帝，⁴⁴⁰ 年，他将国号改为“太平”。⁴²⁴ 年，寇谦之至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向太武帝献道书，崔浩以“辞旨深妙”上疏盛赞，太武帝派人往嵩山祭拜，第二年在平城东南立天师道场，称新天师道，后人称为北天师道。⁴⁴² 年，太武帝亲至洛阳道场，接受寇谦之的

法物，依法成为道教徒，道教也变成了国教。445年，太武帝镇压了长安的一起叛乱，他发现一座佛教寺庙里藏有武器，于是下令将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杀死。446年，开始在全国禁佛，下令杀尽全国各地所有的和尚，毁尽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以此表示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不信奉胡神。中国的佛教史学家称此为第一次“法难”。魏太武帝下令灭佛后没过多久，便染上重病，他怀疑这是佛祖的报应，对灭佛之举非常后悔。他死后，魏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继位，便开始兴佛，并大规模地营建寺院庙宇，最突出的是开凿云冈石窟。

相传，文成帝复佛法后，凉州禅师昙曜来到平城，路上遇见文成帝的车队，皇帝的马咬住昙曜的袈裟不放，文成帝认为这是应了“马识善人”的说法，是天赐高僧，遂以师礼待之。昙曜建议在京城西武周山北崖（又名云冈）开凿石窟，文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请他主持工程。昙曜率万名工匠开凿出5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16窟至第20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五座石窟中的五尊巨佛，顶天立地，犹如五座高峰。五尊巨佛神态各异，除第17窟为交脚弥勒坐像外，其余四窟均为释迦的立像和坐像，他们中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安详沉静。有意思的是，这五尊巨像都是按照魏太祖以下五位皇帝的形象雕刻的。第16窟佛像就是模仿了年仅20多岁的文成帝的样子，在这尊佛象的脸上和足下还嵌有黑石头，据说那是皇帝身上长的黑痣。为了使当时的统治者支持佛教，昙曜在雕凿巨佛像时，费尽了心机。从公元460年至494年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迁都洛阳的35年时间里，无数的神工巧匠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建成了这座绵延一公里长，有53个洞窟、大小51000余尊造像的不朽的艺术之宫。

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平城带到了洛阳。洛阳城南25公里处，有一处山奇林郁、景色宜人的游览胜地。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过，河西岸为龙门山，东岸为香山。龙门石窟就是在两岸山壁上开凿的，长达一公里多，是继云冈石窟之后的又一佛教石窟艺术宝库。孝文帝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和北宋诸朝，相继大规模开凿达五百年之久。其中宾阳洞中的两组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表现了魏孝文帝和皇太后礼拜佛祖的情景，画面宏大，构思细腻，堪称超绝之作。可惜这一瑰宝于1943年被盗往国外，如今只剩下两块凹坑，就像一双愤怒的眼睛，死盯着可耻的强盗。这两件珍品现静静地躺在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和堪城纳尔逊艺术馆，思念着山清水秀的龙门故乡。

北魏虽有魏太武帝灭佛之事，但总的来说，对佛教是支持的，据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国家约有寺院6478座，僧尼共67258人。到北魏末年（公元6世纪初），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徒200万人。

北朝继北魏之后，几经变化，北周（557—580）又成为北方强国。北周是鲜卑族的一支宇文部建立的国家，以长安为国都，武帝时国势最强。北周武帝以灭佛著名，他对佛教的迫害被称为第二次“法难”（574—576）。周武帝禁佛动机与魏太武帝相似。在他看来，佛生在西域，而自己不属于五胡，因此不能对佛出以敬心。为了表示自己比汉人还汉人，他要将对非正统的佛教废掉。与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灭佛，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手段。当时有个叫卫元嵩的人，曾出家为僧，后还俗，想借反佛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他著佛道二论，崇道抑佛，并和道士张宾一起排斥佛教，大得武帝宠信。武帝向来崇奉儒学，于是形成了儒道联合攻击佛教的形势。568年，周武帝在大德殿召集百官、僧人、道士，亲自讲授《礼记》，以此突出儒学的特殊地位。569年，周武帝于大德殿再次召开大会，讨论佛、道教义，其后又几次聚众讨论三教优劣。573年，周武帝再次召集百官、儒生、道士、僧徒开大会，亲自将三教排队，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被贬到第三位。这引起了佛教徒的强烈抗议。574年，周武帝下令禁佛，要求僧尼必须还俗，佛像被破坏，经卷被销毁，约有4万所以上的寺院，赐给王公当宅第，寺院的财产也被没收。与此同时，道教也未能逃脱厄运。577年周灭北齐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还俗人数达二、三百万人。但是，在当时，佛教已在中原流传了几百年，有了

相当的社会基础，想以政治手段消灭它，是不可能奏效的。578年周武帝死，禁佛令也随即废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很有特点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吸收和发展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为唐朝佛教的鼎盛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全盛时期。

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佛教在发展中，努力适应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对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使佛教日趋儒化，同时也接受道家思想的熏陶，追求与“道”相冥合的精神境界，将儒、道学说融于佛理之中，逐渐形成了不完全相同于印度思想的中国佛教学说和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

经过近300年的分裂，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隋王朝。隋文帝即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北周所掀起的灭佛运动，重新恢复了佛教。隋文帝恢复佛教，除政治因素外，还在于他与佛教的特殊关系。据说，他是在一座寺院中诞生的，生他时，寺内紫光冲天，预示着他非等闲之辈。一个尼姑收养了他，抚养到12岁，对此他感恩不尽，后来回忆起这位尼姑还亲昵地称她为阿闍梨，即导师之意。隋文帝统一天下后，诏令在五岳胜地各建寺院一座，并恢复了北周禁佛时期遭到破坏的寺院和佛像，令昔日沙门重新入寺传教，百姓亦可随便出家。

隋文帝一方面恢复佛教，另一方面也将佛教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他在新都大兴城（长安城东南）建立了国家管理佛教的中心——大兴善寺。“大兴”有吉祥之意，可以使人联想到“大兴”汉朝伟业，“善”是该寺所在的街道名称。寺内的昭玄寺，是个行政管理单位，寺内由“大统”寺官主持。昭玄寺在各州设有分寺。约在584—585年，已在45州建立了大兴国寺，以负责国家交给的宗教管理任务。隋文帝兴佛，主要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抬高他的地位。他对佛门的大量施舍和对臣民的乐善好施，是想仿效“转轮王”（古印度神话中的“圣王”）而自称为普世之君，作为菩萨的代理人进行统治。他在45个州里兴建大兴国寺，就是要提醒臣民，在大兴城有一“菩萨天子”在进行统治。

隋文帝在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后，更加注重佛事活动，经常赐斋，赏赐僧徒礼物，向寺庙频繁捐献。这一活动以分舍利、建舍利塔达到高潮。此项佛门盛事于601年、602年、604年先后举行3次。他仿效古代印度最大护法阿育王，亲手将舍利装在特制的佛骨瓶内，派名僧和高级官员将舍利分送全国各州，并在当地建起庄严、肃穆的舍利塔进行祀奉。他在全国各地先后建起111座佛塔。不过，比起阿育王一日内建起84000座佛塔来，隋文帝还是显得逊色多了。

隋文帝死后，其子杨广继位，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隋炀帝。隋炀帝本身就信奉佛教，称帝后继续支持佛教。他娶了一位南方公主为妻，这是位聪明好学，很有文才的漂亮姑娘。杨广非常爱她，也很尊敬她。她经常给夫君介绍南方的生活方式，使杨广非常热爱南方生活，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他有较广博的佛经知识，对佛教的信仰也还虔诚，对当时南方名僧智顗（538—597）相当尊敬。他任扬州总督即晋王时，于591年为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一千名南方僧人设斋度。大斋之后，由应邀来扬州的智顗为这位年轻的皇子受“菩萨戒”。智顗给这位居士取法号“总持菩萨”。智顗回天台山寺院后，杨广还经常资助那里的寺院，二者之间定期有书信往来，有些信件一直保留到今天。智顗曾送给杨广一顶天冠，杨广非常感激，回信致谢：“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智顗圆寂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在天台山下造寺，登帝位后赐“国清寺”匾额。

智顗，又称“智者大师”，天台宗的创始人。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